

早报

1824

29/1/2023
zbnw@sph.com.sg

专刊
zbnw



音乐零工

在梦想与现实间徘徊

本地音乐专才估计有近千人，然两个全职乐团新加坡交响乐团和新加坡华乐团的总席位却不超过200个。在僧多粥少的情况下，大部分演奏专业毕业生只能以零工方式参与演出。为了生活，他们不得不从事不同副业，包括教学、音乐会策划、经营小生意等，支持自己的音乐梦。

《专题故事》p2-5



报道◎张鹤杨

zhanghy@sph.com.sg

封面设计◎黎巧缘

(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新加坡独立建国后,在短时间内从实现温饱到人均收入名列世界前茅,是举世瞩目的经济传奇,同生活水准与日俱增的,还有人民对文化精神生活的追求。

从遍地开花的音乐学校不难看出,本地父母不仅在子女的艺术教育上舍得投资,也出现更多愿意接受孩子以音乐为职业的家长。近年来,“神童系”新加坡演奏家如蔡珂宜、娄楷文等,在国际顶级赛事和舞台上大放异彩。然而天才可遇不可求,天才背后更多的是贡献“分母”数量的普通人。

今年是本地第一所大学级别音乐学院——杨秀桃音乐学院成立20周年,加之留学归来者,本地音乐专才保守估计已近千人。然而本地只有新加坡交响乐团和新加坡华乐团两个全职乐团,总席位不超过200个,且面向全球开放竞争。对于未能入团的大多数以演奏为业者,他们正过着怎样的生活?

今年也是南洋艺术学院和拉萨尔艺术学院联合成立的新加坡艺术大学的启航之年,对于怀揣梦想报读音乐表演的专业生,他们对未来又该有怎样的期待与准备?

零工模式可共享资源

虽然官方性质的国家乐团只有两个,但本地音乐厅节目单上的名字却令人眼花缭乱:re:Sound室内乐团、亚洲文化交响乐团、旅行者小交响乐团(Wayfarer Sinfonietta)、创乐者交响乐团(Orchestra of the Music Makers)、大都会管弦乐团(Metropolitan Festival Orchestra)等近十个交响乐团;此外还有各个民众俱乐部属下的管乐队、华乐团等数



谢涵昱认为,本地应该培养一班音乐人,专做一摊事,哪怕固定薪水很少,但要扎根精进。



演奏家零工生态

一手艺术 一手生计

本地只有新加坡交响乐团和新加坡华乐团两个全职乐团,能吸纳的音乐专才有限。不少专业水准乐手都是以零工(gig)模式参与演出,即按演出和排练场次受雇的临时工。他们平日从事音乐教学,或有兼职工作,偶尔接gig演出,让他们能重返舞台延续演奏生涯。

十个社区乐团,以一个城市的体量来说,新加坡或许是世界上乐团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

相较于由业余爱好者组成的社区乐团,上述交响乐团其实也很难用“专业”一词定性——虽然乐手都是音乐学院毕业的专业演奏者,但他们并非全职受雇于乐团。换言之,他们都是按演出和排练场次受雇的临时工;而乐团通常也没有固定的演出频次,只当有契机、有资金时才会组织演出。在业内,这样一套从排练到演出的短期工作,被称为“gig”。

据re:Sound室内乐团总经理、本地指挥家郑逸杰(45岁)估算,本地约有一二百名自由职业的专业水准乐手。他们平日从事教学,或有兼职工作,偶尔接gig演出既可增加收入,又能重返舞台延续演奏生涯。

郑逸杰指出,这些“半专业”性质的乐团是本地艺术生态的产物,他

们为本地的多元文化需求提供灵活高效的解决方案,维系着艺术政策、津贴赞助与市场供需之间生态平衡。

“每个乐团都有各自成立的使命和愿景,比如2016年成立的re:Sound室内乐团是为了填补本地小型室内乐团的空白;由我和华乐指挥黄德劬联合发起的亚洲文化交响乐团,则是为了推广亚洲作曲家所创作的交响作品而设。”郑逸杰说:“显而易见的是,维持一个全职交响乐团的成本过高。通过这种‘零工’和‘共享经济’模式,有限的资源可以服务更多团体、受众和艺术追求。”

由本地指挥家连汶华新成立的旅行者小交响乐团去年为“Lirica Arts”“歌剧人”等歌剧团体做伴奏乐团,呈献了三场歌剧制作,一改歌剧以往“挥金如土”的做派,让歌剧艺术在本地走出一条小而精的路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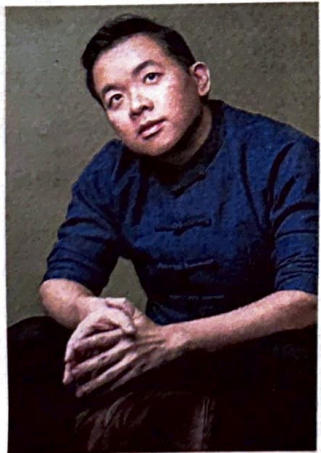
连汶华成立的旅行者小交响乐团,近来成为本地歌剧团体的亲密合作伙伴。

本地乐团名号多，有各自的艺术追求与定位。图为郑逸杰与黄德劬联合组织的亚洲文化交响乐团，演奏本地作曲家莎菲齐亚（Syafiqah）为二胡与印度小提琴而作的协奏曲。



维持一个全职交响乐团的成本过高。通过这种“零工”和“共享经济”模式，有限的资源可以服务更多团体、受众和艺术追求。

——郑逸杰



郑逸杰指出，本地出现职业乐手是近20年的事，一些社区性质的乐团需要时间转型，适应新的市场环境。

乐团是获津贴资助的管道

此外，乐团也是政府津贴、私人赞助流向自雇音乐家的重要渠道。在疫情期间，国会拨款的艺术文化坚韧配套通过国家艺术理事会的展演津贴、自雇人士津贴等项目发放；乐团通过策划节目申请津贴，再以演出劳务费支付给演奏者。

据Resound Collective有限公司2021财年报告，公司当年从政府获得40万元津贴，其中超过14万元支付给gig演奏者；连汶华身兼旅行者小交响乐团的指挥与经理，负责统计演出人数与劳务费后报价给歌剧团体，算是间接从艺理会获得津贴；创乐者交响乐团则向本地作曲家委约创作并在音乐会上首演，兼顾作曲家的生计与事业发展。

不过这种共享模式并非没有隐忧。国家青年交响乐团前首席，本地资深小提琴演奏者谢涵昱（41岁）说：“一个乐手今天拉音乐剧，明天拉交响曲，后天拉巴洛克古乐，艺术水准是不会进步的。”在他看来，如今很多表演虽然越来越多，但水准不如从前。

“新加坡的艺术团体很难靠票房维生，全靠艺理会支持，我们应该对艺理会心怀感恩。”谢涵昱说：“但现在问题是每个人都想成立自己的乐团，艺理会有义务支持，企业赞助和观众口味也‘喜新厌旧’，结果乐团越来越多，却从不专心。我们应该培养一班人，专做一摊事——哪怕只是很少的固定薪水，但要扎根精进。”

演出酬劳有国际竞争力

记者了解到，一场三个小时的标准排练，酬劳在100至150元之间，演出当场会稍高一些；一套gig算下来，约有几百至千元的收入。

“这个价格是由市场决定，其中很重要指标就是新加坡交响乐团开给临时乐手的价码，因为他们是行业的领头羊。”郑逸杰说：“作为re:Sound的总经理，我一般都以此为参照。”

关于这个价位是否合理，业内有不同声音。一方认为，这个价格不仅在区域内最高，较之其他同等水平的发达国家也有竞争力；另一方则认为，专业演奏者的课时费一般可达到每小时百元，三小时排练的报酬偏低。

谢涵昱说，疫情前大都会管弦乐团有次跟来自韩国首尔的乐团合作，外国同行听到本地的演出劳务费表示惊讶，几乎是首尔的两倍。“我在伦敦留学时的小提琴教授，每节课费也才60英镑（约97新元），但在本地有英皇8级文凭就可以要价100元。”

郑逸杰则认为，排练和演出费也应该与演奏者的课时费相当，因为演出对于乐手的精力要求高过教学。“在家教学或许还可以轻松对待，但在乐团排练和演出须全神贯注地投入，甚至还要求排练前读谱练习。”

他说：“我当然希望付给乐手更多薪水，但音乐会是不赚钱的生意，基本都靠政府和企业的赞助，票房更指望不上。”

商演义演区别大 演奏者须明辨

有些情况下，乐手演完整套gig下来只获得100元的“感谢费”。郑逸杰解释说，一场演出如果有政府资助或企业捐款，或受聘于金主的商业演出，就可以按市场价支付乐手劳务费；而有些则是义务性演出，乐团通常只会付乐手“感谢费”（token of appreciation）。

“商演与义演之间并无十分明显的区别，完全取决于当场背后的经纪模式。比如去年由华夏文化促进会邀请亚洲文化交响乐团呈献的新春音乐会，就是标准的商演。但像亚洲文化交响乐团自家的例常音乐会，就是基于志愿者性质——大家是为了相同的艺术追求走到一起。”

也曾担任新加坡管乐教师协会主席多年的郑逸杰指出，新加坡所有管乐团的演出都是志愿性质，甚至没有感谢费。他说：“这是个历史遗留问题。十几二十年前，很多联络所、俱乐部都有管乐团，由社区爱好者组成，在业余时间以乐会友。但过去10年最大的变化是，本地出现越来越多专业演奏者，也出现‘半专业’管乐团。”

“对于专业演奏者，演奏是他们谋生的工作，应该得到报酬，但义务演出的习惯在管乐界还没转变过来；而且更现实的一点是，管乐团也比较难像交响乐团一样接到商演。我听说有乐团付管乐手的酬劳低于弦乐手，这是不可接受的。”

郑逸杰认为无论商演还是义演，最重要的是演奏者事先要和乐团经理达成共识，才能保持愉快且长期的合作。“不过也有乐团最终支付和事前许诺的不一致，这种乐团在我们圈内会被列入黑名单。”

小提琴手彭恩慧（27岁）说：“理想的情况是在演出前签一份合约，比较有保障。”

》文转p04

一个乐手今天拉音乐剧，明天拉交响曲，后天拉巴洛克古乐，艺术水准是不会进步的。

——谢涵昱



谢涵昱（中）为客户策划的60大寿音乐会，亲任音乐总监及独奏家。

专题故事

》文接p03



彭恩慧认为，教学是本地专业演奏者主要且稳定的收入来源。

彭恩慧 | 教学是主要收入来源

彭恩慧2020年5月从美国克利夫兰音乐学院毕业后，很快就在本地一所私人音乐学校找到全职工作；去年8月她从学校离职，成为自雇小提琴教师，也开始接gig演出。

去年11月的行情不错，彭恩慧接了两场音乐会和四五场婚礼演出，但12月一场演出也没有。

“教学还是最主要和稳定的收入来源，毕竟演出机会要碰运气。”彭恩慧说：“虽然演出酬劳按小时算低

于课时费，我还是很喜欢去演gig。因为当初选择读音乐就是出于对演奏的热爱，毕业后很难得有重返舞台演奏交响乐的机会，而且还能跟圈内好友联络感情。”

不同乐器行情有别

去年结婚的彭恩慧和先生与家人同住，她目前约有15个学生，经济压力并不大。

“我感到很幸运的是，当初决定



彭恩慧（左二）与朋友组成四重奏，常接婚礼演出的工作。

学音乐时得到了父母坚定的支持，让我对未来没有过多的担忧。”彭恩慧说：“但是我们明年打算买房，算上各种保险相信会有更多账单要付，我打算收更多学生。”

彭恩慧说，作为一名自雇音乐教师，最重要的是建立起口碑，才能有不断的生源。不过她也提到不同乐器有不同行情，钢琴是最热门的，其次是小提琴；中提琴和低音提琴相较冷门，但专业毕业生也少。

当初选择读音乐就是出于对演奏的热爱，毕业后很难得有重返舞台演奏交响乐的机会，而且还能跟圈内好友联络感情。

——彭恩慧



谢涵昱四年前创办Harmony Studio，身兼总监、策划、导演、摄影、乐手等多重角色。

谢涵昱 | 音乐家拥有时间和自由

谢涵昱说，作为一名自雇音乐教师，教20个学生是比较舒服的工作与生活状态——每周约工作20小时，平均月收入有五六千元，还有空档接演出。

不过每当有学生想报读演奏专业的时候，谢涵昱都会为他们做“心理建设”。他说：“音乐家是没有‘career path’（事业晋升路径）的，没有人给你升职或加薪，我们能做的是接一份又一份的工作。好处是我们拥有自由和时间创造自己的作品和事业，比如成为制作人、编曲、企业家等。”

音乐家须身兼多重身份

杨秀桃音乐学院副院长（职业指导和社区参与）陈子乐说：“音乐

音乐家是没有“career path”（事业晋升路径）的，没有人给你升职或加薪，我们能做的是接一份又一份的工作。

——谢涵昱

人常常身兼多重身份，一名艺术管理者，同时也是一名出色的演奏家，并且担任社区领袖，这在我们校友中是很常见的。

“21世纪的音乐家不能仅仅会玩乐器，我们从学生入学的一刻起就向他们灌输这一观点。在整个行业中，既需要创造音乐的音乐家，也需要以各种身份让音乐得到实现的音乐家。”

陈子乐指出，“如今我们看到越来越多年轻音乐家融合自己的艺术造诣，对商业的洞悉和科技的应用，开辟出自己独特的道路。他们不仅创造自己的事业，也可以为更多人提供就业机会。”

四年前，谢涵昱创办了Harmony Studio，提供音乐会策划、编曲、演奏、视频拍摄、剪辑等全方位服务。疫情期间是全行业数码化的加速期，他承包不少委约制作，包括大华银行年度绘画比赛的颁奖典礼等。

谢涵昱从国外留学归来后，在政府中学和国际学校担任音乐教师近20年，去年离职成为自由职业者。他说，自己很幸运可以一直有稳定工作，还能通过接gig拥有舞台人生；如今年过四十，希望尝试一种新的生活。

蔡欣洁 | 从音乐厅到豆花摊

演奏家的工作时间与常人颠倒，拖着—袭晚礼服回到家往往已是夜半时分。但圆号手蔡欣洁（31岁）每天一早六七点就要开始忙碌，因为她的另一身份是武吉巴督一座组屋咖啡店的“豆花西施”。

蔡欣洁毕业于南洋艺术学院与杨秀桃音乐学院，师从新加坡交响乐团前圆号名家韩昶畴。她常与大都会管弦乐团、新加坡歌剧团（Singapore Lyric Opera）等临时乐团合作，不过管乐相较弦乐的需求少很多，淡季时两三个月才能接到一场演出。



蔡欣洁在疫情
期间设计出一套儿童
音乐早教课程，借由口风琴
介绍键盘、管乐等概念，深受家长喜
欢。（龙国雄摄）

明年我会参与音乐剧《冰雪奇缘》，全季演出约50场，我非常期待和享受和朋友们在一起玩音乐的时光。

——蔡欣洁

创业积累经验

约半年前，她顶下咖啡店的一个小档口，售卖豆花和豆奶，开创副业。从光芒万丈的音乐殿堂走进邻里咖啡店的人间烟火，是否有损一名音乐家的自尊？蔡欣洁十分爽朗地回应：“我刚来这里时，总有安哥安娣问我，小妹你为什么来这里卖豆花水？我就笑着说，我不是打工的，我是老板，哈哈。”

“我这个年龄的人都有一颗创业心。餐饮业是我从来没涉足过的，因缘巧合下我有机会来体验一下，积累商业经验是很难得的。”

创办自己的音乐品牌

蔡欣洁目前有约10个私人学生，在两所学校指导管乐团，此外她还有自己的音乐创业品牌“Stage



蔡欣洁是一名圆号手，经营“豆宝宝”豆花摊是她的其中一个副业。（龙国雄摄）

Artist”。

“疫情期间无法登台，尤其是管乐手最受限制。于是在家里自己设计了一套儿童音乐教育课程，以口风琴（melodica）为教具，我还自己写了一本教材。”

蔡欣洁说：“小孩子没办法学钢琴，但口风琴是用吹的，而且轻便便宜，有像钢琴一样的键盘，很适合儿童普及教育。很多家长都向我们咨询全套课程。”

一人分饰多角十分消耗体力，蔡欣洁平均每天都要忙到晚上9时以后才能放工。她想更专注于音乐事业，正与潜在客户商谈，出售“豆宝宝”品牌和摊位。

“我希望可以腾出更多时间和朋友在一起。”蔡欣洁说：“明年我会参与滨海湾金沙剧院上演的音乐剧《冰雪奇缘》，全季演出约50场，我非常期待和享受和朋友们在一起玩音乐的时光。”

演奏教学主次有别 全职乐手也多有兼职

虽说考入全职乐团领固定薪水是许多音乐生的夙愿，但实际上全职乐手大多也在业余时间教学，只是演奏和教学的主次不同。出于行业性质，乐团的工作时长并不饱和，平均每天只工作四五个小时。若非财力雄厚的国家乐团，薪资水准自然也有落差，乐手们通常经营自己的副业，最常见的是在学校指导学生乐团，也有人从事房地产、保险经纪等职业。

2018年，黄显行（36岁）离开政府中学，辞去训导主任的职务，成为全职演奏者时，要接受断崖式的降

薪。当时他的大儿子刚刚出生，还有房贷车贷要还，经济压力可想而知。好在他有自己创办的华乐学校“华乐满屋”，并且每月拿到一笔数目可观的奖学金，在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攻读笛子声学博士学位；代价是，他每天要忙碌到晚上10时回家后，才能坐下来安静读书。

非音乐学院科班出身

和大多数以演奏为业者不同，黄显行非音乐学院科班出身，而是毕业于国立教育学院的数学老师。不过他

自幼师从笛子名家詹永明，一直是国家青年华乐团的一把好手；就读教育学院期间，他也在多所学校担任笛子指导，每年全国华乐比赛笛子组都有他的学生获奖。

“我向来热爱演奏，但是詹老师深知这个行业不易，也知道我会读书，所以劝我往上念书。”黄显行说：“2012年成为全职教师后，我加入鼎艺团成为客卿演奏家。虽然是客卿，但我六年里只缺席过两场演出；2018年，我决定全身心投入华乐事业。”

因买房开始钻研房地产

2021年是黄显行人生轨迹的又一转折点。“因为家庭又添新成员，我们打算换购房子，没想到组屋的售价竟然比五年前的房价还亏了不少。”黄显行说：“作为一名数学老师我实在感到惭愧啊……而我又热爱学习，喜欢钻研的人，于是开始钻研房地产市场，并考了房产经纪的执照。”

黄显行刚刚完成学业，成为黄博士。问他成为博士后是否有更高的职业追求？他说：“我研究的笛子声学是我非常感兴趣的课题，也是我的兴趣爱好，并不为了找工作。过去几年一直拼事业，感觉亏欠家人很多，下来我会花更多时间陪伴太太和孩子。”



黄显行事业家庭双丰收，一家五口幸福美满。

我向来热爱演奏，但是詹（永明）老师深知这个行业不易，也知道我会读书，所以劝我往上念书。

——黄显行



黄显行作为独奏家与鼎艺团同台。